

河西汉长城

本报特约撰稿人 李博文

在我国西北,河西走廊恰似一条由大自然鬼斧神工建造的天然路桥,将黄土高原、蒙古高原、青藏高原、西域地区四大地理单元紧密连接起来。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在取得对匈奴作战的重大胜利后,汉王朝获得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权,为实现“隔绝羌胡、断匈奴右臂”,以及辐射西域的战略,汉中央政府随后逐步在河西修建了规模宏大、体系完备的长城防御体系,将河西走廊地区建设成保卫中原安全的铜墙铁壁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

守护长久和平

众所周知,汉长城的修建主要是为了保护关中和华北平原免受匈奴游牧帝国的劫掠与破坏,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匈奴一直是汉政权的严重威胁。匈奴之所以不断入关抄掠,就其根源而言是由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决定的。如太史公言,匈奴人“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汉初至汉武帝时期,匈奴击破、驱逐月氏,控制西域,“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人”,军事力量空前强大,如何应对匈奴威胁,就成为汉帝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西汉初年,中原大地千疮百孔,新生的汉政权无力组织大规模军事行动反击匈奴,和亲成为无奈的选择,但效果却并不理想。和亲政策使匈奴日益骄横。汉文帝时,关于匈奴南下抄掠的记载更是不绝如缕。为了缓解激烈的冲突,汉景帝继续和亲,但汉家边塞风声鹤唳,狼烟四起。事实证明,和亲不仅没能带来和平,反而降低了匈奴南下剽掠的成本,加剧了农耕与游牧政权的冲突。因此,至汉武帝时,汉朝选择了主动出击。汉武帝时期对匈作战成果丰硕,但其对于汉朝自身的伤害,也同样不容小觑。如班固说:“当孝武时,虽征伐克获,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长期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由此可知,无论委曲求全的和亲,还是大张挞伐的战略进攻,都无法维持长久的和平。针对如此两难的局面,汉帝国在深入分析汉匈双方优劣形势的基础上,选择了大规模修建长城以捍卫和平的方法。历史学者徐卫民教授指出:“游牧经济的生活方式,使匈奴军队易于逃窜,从而免遭汉朝主力部队的打击,汉朝军队则由于必须依赖内地后勤补给,故无法长时间持续作战并巩固胜利成果。针对匈奴游牧帝国的特殊优势,只有通过修筑长城进行积极防御,才能有效遏制农牧政权之间的冲突,从而塑造和平,保卫胜利果实。”

自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始,至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廷在河西持续修筑长城,其中大规模营建集中于元鼎六年至太初年间,汉代河西长城东起今永登县西至敦煌玉门关,烽燧体系延伸至今新疆境内。

近40年来,得益于大量简牍史料的出土与解读,河西汉长城的面貌变得越来越清晰。可以肯定的是,河西汉长城是在充分考虑当地自然环境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设计,因地制宜所构建起来的包括坞堡、烽燧、天田、塞墙、堠壕在内的完备防御体系。

1974年8月,甲渠候官遗址16号房址出土了新莽时期17枚简牍,详细记载了不同军情之下的通讯规定。此外,为激发边塞军民的成边热情,汉朝还制定了十分详细的军功和物质奖励制度。在丰厚奖励的激励下,汉代边塞军民在保卫家园的行动中奋勇争先。司马相如描述河西军民“闻烽火燧燧,皆辍弓而驰,荷兵

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后;触白刃,冒流矢,义无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汉代名将赵充国在评价万里长城军事防御效果时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

随着河西以及其他地区长城防御体系的日益完备,匈奴大规模南下掠夺付出的代价较之于汉代初年极大增加。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企图通过突然袭击重新夺回河西走廊,其结果是“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自是后,匈奴不敢入张掖”。显而易见,自长城防御体系建成之后,匈奴南下的成本逐渐超过了其掠夺所得的利益,这一结果表明长城这一伟大的防御工程在遏制农牧冲突问题上的巨大成功。长城防御体系的修建,使得农耕政权可以充分发挥自身在科学技术、物质积累、组织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得以凭借长城保卫农耕地区的生产和经济安全,并有效遏制游牧政权的侵扰与劫掠,迫使其以和平的方式与农耕地区交流,从而实现农牧交错地带的持久和平。汉昭帝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稀复犯塞”。可以说汉长城的存在,迫使匈奴不得不以和平友好的方式同汉朝进行交流,从而给汉匈双方带来长久的和平。

长城防御体系的完善,不仅是军事层面的胜利,更标志着西汉王朝边疆治理模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建构。在长城沿线,汉代逐步形成了以军屯、民屯相结合的边防体制,士卒且耕且守,民众亦兵亦农,既减轻了中央长途运输粮草的沉重负担,又实现了边境地区的长期稳定。这种“兵农合一”的治理方式,使河西走廊从单纯的军事防线,逐渐转变为能够自我维持、自我发展的边疆区域。

从战略层面看,河西长城的修筑,真正实现了“隔绝羌胡,断匈奴右臂”的西汉国家战略。匈奴失去河西这一重要牧场与通道后,难以再与青藏高原的羌人各部形成联合夹击之势,汉朝西北边境的战略压力大幅缓解。与此同时,长城烽燧所构建的预警系统,使小股骑兵难以奏效,大规模军事入侵又代价高昂,匈奴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以劫掠为主的对外策略,汉匈之间的互动模式由此发生根本性转变。

可以说,河西长城以有形的墙体,构筑起无形的秩序,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划出了一条相对稳定的界限,既守护了中原百姓的生产生活秩序,也在客观上推动匈奴内部走向分化与转型,为之后长期的和平交往奠定了坚实基础。

护航丝路繁荣

从汉昭帝时起,随着长城军事防御功能的日益彰显,汉匈关系由激烈的军事冲突逐渐转变为和平交流。汉匈关系改善所带来的和平局面,促进了河西走廊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使河西地区逐渐成为内地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款塞(自愿臣服汉朝,并为之守边)。对此汉朝政府予以高度礼遇,史载“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此后,呼韩邪单于与汉朝的关系愈加亲密。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次入朝,与汉朝订立盟约,双方约定“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

按《史记》与《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期,西汉政府曾多次向河西地区大规模移民。有学者统计武帝时期先后向西北边郡移民累计可达百万以上。大量内地移民的到来使河西地区经济建设有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西汉政府还通过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种植技术的办法,促进河西及其他边境地区的农业发展。如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政府在边郡地区大规模修建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此后大力推行适宜西北干旱地区的代田法,收效甚好。在内地移民的辛勤劳作下,河西地区经济发展欣欣向荣。《汉书·地理志》云“自武威以西,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地区经济的空前繁荣使得河西地区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担负起连接内地与西域交通的重要使命,汉朝政府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建立起覆盖



金昌汉明长城

走廊的交通网络。甲渠候官出土的里程简,记录了河西走廊内部的驿道与驿站系统,反映了当时河西走廊地区发达的驿站交通网络。难以想象,如果没有长城的保护和河西经济的发展,单纯依靠内地输血,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维持长达1000余公里的交通网络的,至于辐射西域更是空谈。在长城的庇护下,在驿站交通的支撑下,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使节来往不绝如缕。历史学者王子今教授指出,“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往来,是在河西长城的安全保障下

实现的,这条通道不仅保护了丝路贸易路线的畅通,还为东西往来的使团提供了后勤保障。”

在长城的庇护下,丝路贸易空前繁荣,中西方物质文明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种域外珍奇汇聚一堂,极大拓宽了当时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河西走廊作为丝路贸易的黄金通道,其社会经济自然也获得了极大发展。两汉之际,天下扰乱而河西独安,史称凉州姑臧“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

促进文化融合



汉代长城军事要塞玉门关遗址

在长城的保护下,汉匈之间由金戈铁马、剑拔弩张的战争关系,逐渐演变为友好相处,持久和平的亲睦关系。汉匈关系的改善,不仅带来了丝路贸易的空前繁荣,还极大地促进了人员往来,促使包括河西地区在内的长城地带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居局面。至东汉和魏晋时期,匈奴与西域各族对中原文化的归属

感、认同感不断加强,塞北和西域文化也渐渐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

《汉书》中记载了龟兹王绛宾入长安朝贡之后全面学习中原礼仪文化。在汉家典章制度传至西域,引起西域诸国争相效仿的同时,西域的民俗文化也进入内地。至东汉末年,西域的葡萄酒已经风靡中原,成为当时中原社会十分珍视的饮品。此外,魏文帝曹丕也是葡萄酒的爱好者,他称赞葡萄酒道:“且设葡萄酒,醒醉掩露而食。甘而不涩,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麴米,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耶。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

在长城保护下,河西走廊的交通网络得以建立,经济日渐繁荣,为丝路贸易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汉风胡韵沿着河西走廊和长城,进入塞北,走进中原,流入西域。

在长城守护的和平环境中,不同人群在这里比邻而居、互通有无,语言、服饰、生产技术、生活习俗相互影响,逐渐形成包容开放的地域文化特质。中原的农耕技术、典章制度、礼乐文化沿长城向西传播,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射技艺、畜牧经验、音乐舞蹈也向东传入内地,彼此吸收,彼此成就,共同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

河西长城在军事防御之外,更承担起文化过渡带与文明融合区的功能。它不是一道封闭隔绝的墙,而是一条有序交流的线:既保障了安全,又促进了往来;既维护了各自的文化传统,又推动了跨区域的文明对话。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在这里交汇碰撞,熔铸为兼收并蓄的地域文明。

纵观历史,河西走廊汉长城的价值早已超越单纯的军事工程。它以强大的防御能力带来持久和平,以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丝路畅通与经济繁荣,以开放包容的格局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它既是西汉王朝国家实力与治理智慧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以和平方式实现区域稳定、推动文明交融的历史见证。